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0003

生态批评第四次浪潮：物质生态批评

龚玲

(湖南工业大学 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物质生态批评继承了生态批评的跨学科研究传统，汲取了新物质主义的理论精华，推动生态批评进入了第四次浪潮，标志着生态批评向物质维度的转向。从理论内核看，物质生态批评着重凸显非人类物质所具有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对传统认知中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研究者借助这一批评理论，深入分析非人类物质的能动性及其叙事能力，试图解读现实社会与文学世界中构建的物质生命共同体。物质生态批评致力于弥合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之间的假定鸿沟，进一步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突破了传统生态批评在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种族与自然等方面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过，物质生态批评对于如何应对当下生态危机的窘境也没有清晰的方案，本质上看，其还只是未完成的物质故事理论。

关键词：物质生态批评；生态批评；物质话语；物质故事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5)05-0032-08

The Fourth Wave of Ecocriticism: Material Ecocriticism

GONG Ling

(Colleg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Material Ecocriticism inheri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radition of Ecocriticism and absorbs the theoretical essence of New Materialism, thus pushing Ecocriticism into the fourth wave, marking its important turn to the material dimension.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Material Ecocriticism emphasizes the subjectivity and agency of non-human matter, red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matter in traditional cognition. Researchers use this critical theo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agency and narrative ability of non-human matter, attempting to interpret the material life community constructed in the real society and literary world. Material Ecocriticism is committed to bridging the assumed gap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matter, further criticizing anthropocentric thinking,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Ecocriticism's binary oppositional thinking patterns in human and nature, culture and nature, race and nature, and other aspects. However, Material Ecocriticism lacks a definitive strategy for addressing the ongoing ecological crisis. At its core, it remains an incomplete theory of matter story.

Keywor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Ecocriticism; matter discourse; matter story

收稿日期：2025-03-10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联合项目“韩少功和梭罗的生态书写比较研究”(20WLH14)

作者简介：龚玲，女，湖南汨罗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化。

物质生态批评作为 21 世纪新兴的生态批评理论话语，聚焦于物质层面的生态关联，通过构建独特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深入剖析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物质生态思想。这一理论不仅为生态批评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视角与方法论工具，还推动了生态批评领域在理论维度与实践路径上的多元化拓展，使其研究范式更加丰富，学术边界得以进一步延伸。当前学术界对物质生态批评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共识，其研究方法和路径亦缺乏系统性与有深度的探讨。鉴于此，全面梳理并细致解析国内外相关文献，从多维视角探究物质生态批评的萌生语境、理论框架、核心主张、批评实践及未来走向，对于构建和完善物质生态批评的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如此，不仅能够系统化整合物质生态批评领域内零散的理论资源，使之形成更为严谨、科学且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能为整个生态批评学科的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从而进一步拓展其学术视野与实践维度。

一、多重浪潮：物质生态批评的萌生语境

生态批评滥觞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生态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批评范式，其核心在于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深层关联。通过分析文学作品的书写，生态批评深刻揭示了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以及资源枯竭等生态危机现状，并以此为切入点，阐释人类文化价值对自然环境的深远影响，进而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与许多批评话语不同——它们或源于文学研究的内在需求，或出自某些批评家标新立异的主张，生态批评的诞生直接回应了全球生态危机的紧迫性与现实压力。正是在生态危机的逼迫与重压之下，生态批评作为一种独特的批评范式应运而生，其理论根基与实践指向均与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密不可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生态批评理论和概念层出不穷，生态批评的学科融合性特点继续凸显，形成了生态诗学、生态文化学、生态伦理学等交叉学科，拓展了生态批评的研究领域和视野。

“浪潮”这一概念由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提出，他用这一概

念描述生态批评的发展趋势，认为生态批评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浪潮”表明生态批评的发展是一脉相承、前仆后继、此长彼消的，不同的浪潮并非有着清晰而且有序的进化^{[1]17}。生态批评的第一次浪潮关注的是传统的自然写作以及以保护为导向的环保主义^{[1]112}。第二次浪潮重新定义了环境，并越来越关注环境福利以及平等问题^{[1]115}。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瑞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等提出了第三次浪潮这一概念，认为生态批评应该承认种族和民族的特殊性，主张从环境的角度探索超越种族和国界的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2]。自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于 2004 年提出物质—符号现实以来^[3]，生态批评出现了物质转向。物质生态批评是 21 世纪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话语，学界将其视为生态批评发展的第四次浪潮。

物质生态批评作为一种跨学科批评话语体系，是生态批评与新物质主义思想深度融合的产物，彰显了多学科理论资源交互整合的学术特质。它认为世界是一个由意义、属性和过程组成的物质网络，其中人类和非人类物质在网络中相互交织，产生不可否认的象征力量^{[4]2}。其研究对象涵盖身体、物、元素、有毒物质、化学品、有机物、无机物、景观以及生物实体等物质形式；这些物质不仅彼此关联，还与人类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作为一门探讨物质叙事与话语意义的学科，物质生态批评以新物质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解析物质的身体性及其话语网络的运作机制，深入揭示文本与物质世界的内在关联，旨在为话语与物质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开辟新的阐释空间。

物质生态批评突出了非人类物质的主体性和施事能力，从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定义了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主张抹除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人为设定的界限，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突破了传统生态批评关于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种族与自然等关系二元对立思维的束缚，为生态批评主张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存这一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凸显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为如何分析语言和现实、人类和非人类生活、心灵和物质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在生态批评即将出现聚焦“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

和受众的情感反应”^[5]的第五次浪潮^[6]之际,我们对物质生态批评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评价,有助于厘清生态批评发展的现状,有利于生态批评立体体系的构建。

二、融会贯通:物质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模

物质生态批评在21世纪兼收并蓄、迅速发展,呈现出跨学科、跨国家等多元化发展的态势。首先,物质生态批评吸收的观点既来自生态批评学界、生态环境学界,也来自哲学界、物理学界、比较文学学界以及人文学界。其次,学者呈现出多国化特征。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多国学者热衷于物质生态方面的理论构建,力图从物质视角寻求应对方案。

美国物理学家与哲学家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在《与宇宙相遇:量子物理学与物质与意义的纠缠》(*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2007)一书中提出了能动体现实主义(agential realism)概念,将世界描述为一个由纠缠现象的内在行为组成而不是由离散物体的相互作用组成的世界,认为世界是一个动态的内部活动和物化过程。物质生态批评从其理论中接受了有关能动性以及物质之间的纠缠性^[7]的观点。

美国俄勒冈大学环境人文教授斯特西·阿莱莫(Stacy Alaimo)在与苏珊·海克曼(Susan Hekman)合作出版的《物质女性主义》(*Material Feminism*, 2009)一书中,解读了人类以及非人类身体的物质性,提出“试图超越话语建构,与物质性作斗争”^[8]的观点。她们的观点奠定了物质生态批评主张的人类以及非人类物质具有物质性这一理论基石。

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艾布拉姆(David Abram)在其《成为动物:一种世俗的宇宙观》(*Becoming Animal: An Earthly Cosmology*, 2010)一书中,主张从一些基本的文化假设的束缚中跳出来,思考一系列关于身体、物质性和科学语言的反思性问题,密切关注物质本身,关注它们展示自己的独特方式以及将物质从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表达形式^{[9]6-7}。同年,阿莱莫在《身体本质:科学、环境与物质自我》(*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2010)一书中

提出了跨体性(trans-corporeality)概念,认为人体与环境相互渗透,这种渗透性超越了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之间的假定界限^[10]。同一年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人文学教授简·本尼特(Jane Bennett)所著的《活力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 2010)问世,她提出,物质和能动性“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个密集的关系网络中”^[11],世界是能动性的“密集网络”。这一思想构成了新物质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主导思想,也是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观点。

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国际研究学院的阿克塞尔·古德博迪(Axel Goodbody)教授、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学院的凯特·里格比(Kate Rigby)副教授编著的论文集《生态批判理论:欧洲新方法》(*Ecocritical Theory: New European Approaches*, 2011)收录了一些关于物质生态批评的论文,主要有希瑟·沙利文(Heather I. Sullivan)的《亲和力研究与开放系统:歌德〈浮士德〉的非平衡生态批评解读》(*Affinity Studies and Open Systems: A Nonequilibrium, Ecocritical Reading of Goethe's Faust*, 2011),美国梭罗研究专家劳拉·达索·沃尔斯(Laura Dassow Walls)的《从现代到生态:拉图尔论瓦尔登湖》(*From the Modern to the Ecological: Latour on Walden Pond*, 2011),安妮·埃尔维(Anne Elvey)的《文本的物质性:物质互文性与〈圣经〉的生态批评对话》(*The Matter of Texts: A Material Intertextuality and Ecocritical Engagements with the Bible*, 2011)。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环境与人文学教授罗伯·尼克松(Rob Nixon)在《缓慢暴力与穷人的环保主义》(*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2011)一书中将政治、全球污染和环境正义的交织置于一个时间视界之上。在这个视界中,身体和地方成为新殖民主义形式暴力的表现场所。这本论文集收录的文章集中体现了物质生态批评的基本观点,引领了生态批评的新风尚。

由希瑟·沙利文与美国学者达娜·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合编的论文集《物质生态批评:泥土、废弃物、身体、食物及其他物质》(*Material Ecocriticism, Bodies, Food and Other Matter*,

2012)是第一次关于物质生态批评话题的集体发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杰弗里·科恩(Jeffrey J. Cohen)先后出版了《动物、蔬菜与矿物：伦理与物》(*Animal, and Mineral: Ethics and Objects*, 2012)、《生态物质主义》(*Ecomaterialism*, 2013)、《棱镜生态学：超越绿色的生态理论》(*Prismatic Ecology: Ecotheory beyond Green*, 2014)等,强调了混合能动性、物质叙事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由意大利都灵大学塞瑞纳拉·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教授与土耳其哈希坦普大学瑟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教授编著的《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于2014年出版。这部论文集博采众长,收集了21世纪与物质生态相关的众多重要论文,其可以被认为是物质生态理论的奠基性作品。

另外,有学者将物质生态批评的基本观点与其他学科观点结合起来,提出了生态叙事学、情动生态学等概念。在专著《故事世界协议：生态叙事学与后殖民叙事》(*The Storyworld Accord, Econarratology and Postcolonial Narratives*, 2015)中,美国学者伊琳·詹姆斯(Erin James)正式提出生态叙事学(Econarratology)的概念。生态叙事学“将生态批评对文学与物理环境关系的兴趣与叙事学对作家创作叙事的文学结构和手法的关注结合起来,探讨叙事文本中物理环境再现的形式特征以及其和文本产生的物理及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联,读者用来建构故事世界的文本线索以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被激发的想象力对其世界观的影响”^[12]。奥地利学者阿历萨·韦克·冯·莫斯纳(Alexa weil von Mossner)曾在《情感生态学：共情、情感与环境叙事》(*Affective Ecologies: Empathy, Emotion, and Environmental Narrative*, 2017)中阐释了摄影机移动、剪辑等影像运动模式如何引导观众官能产生情感,继而影响其对生态的认知。

这些学者关注了物质本身的内在生成动力,颠覆了之前笛卡尔实体论以及牛顿机械论关于物质的惰性的描述,重新定义了传统视角下无生命物质的力量。他们从非人类中心视角重新思考了物质之间应有的联系,突破了占据哲学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对表意系统的思考,重新定义了人与其他物质之间的关系。

三、物质话语：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观点

物质生态批评融合了生态批评、新物质主义以及生态后现代主义批评范式,建立了一套具有物质特色的话语体系。物质生态批评主张人类与非人类物质一样,都是万物相互联系的网络体系中的物质之一,都是施动者/能动体(agent)。世界是一个物质符号网络,所有的物质都是文本,都可以叙事。

能动性(agency,也有翻译为施事能力或施动性)是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关键词之一。该批评强调能动性并非仅限于人类,而是分布在包括电、毒素、真菌等自然元素以及非人类生命形式的整个物质世界中。如此,物质就不再是被动的、惰性的,无法表达任何独立意义的存在,它与具有心智和主观能动性的人类一样,也具备特殊的能动性。能动性具有多种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它们是物质的,它们产生的意义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人类和非人类的存在。该批评进一步提出,人类与非人类力量相互纠缠,共同塑造了世界的进程。具有能动性的物质在亿万年中持续存在和改变,产生了新的形式、身体和性质,物质世界得以不断地循环发展,保持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因此,作为物质世界的主体,人类、无生命物质以及其他非人类生命形式应该是平等的,能动性是它们的共有特性。

故事物质(storied matter)也是物质生态批评的核心关键词之一。这是一个非人类中心的物质性概念,是对物质投射出活跃动力的过程的创造性揭示。伊奥维诺和奥伯曼认为,世界上的物质现象是一个庞大的能动性网络中的节点,这些能动性可以被“阅读”并阐释为叙事或故事^[41]。所有的物质都是“故事性的物质”,它是一个意义、属性和过程的物质“网格”,其中人类和非人类参与者在网络中相互关联,产生不可否认的象征力量^[42]。物质的故事以身体和话语的形式呈现出来,存在于自然和符号共同进化的景观之中。事物、元素、有毒物质、化学品、有机和无机物质、景观以及生物实体等相互作用,并与人类维度相互作用,产生我们可以解释为故事的意义和话语结构^[47]。故事世界的结构是由物质与意义(matter and meaning)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其核心特征

在于物质身体内部及其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意义关系。物质不仅是物理存在,还具有文化和象征意义。因此,物质和意义共同构成了世界的叙事结构。一方面,物质和意义密不可分,两者的边界在本质上是多孔互通的,这样方便了物质主体在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物质符号联系。另一方面,物质和意义相互融合,物质主体内部和外部之间互相渗透。这样,各种物质运动的轨迹、物质之间的对话及想象都存在于一个物质和意义密不可分、相互融合的维度之中,嵌入“各种各样的敏感身体”中,形成“一个不断展开的故事”^{[9]270-272},构成生活本身以及生活的叙事。意义、故事、符号和话语嵌入物质形式,与人类和非人类的生活和景观相互作用就形成了物质叙事(narrative of matter)。叙事的根源在于物质的能动性,这种叙事能动性作为故事物质的内在生成动力,共同塑造了物质的故事世界。这些充满活力的物质在世界中交织成一张意义的网格,将人类、非人类及其故事紧密联结于这一复杂的网络结构之中。因此,在当前生态危机、污染、大规模生物灭绝、贫困、奴役人类和动物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压迫的节点背后,是自然和文化的纠结。将人类及其他能动体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如何相交的叙事阐释出来,这些纠结便能迎刃而解^{[4]6}。

物质政治(politics of matter)是主要阐释物质话语动力共同塑造人类、非人类和环境的政治维度的方式。正如伊奥维诺和奥伯曼所言,物质生态批评的目的不仅在于探究物质形式的能动性——无论其是否存在、是否有机、是否自然,还在于探究这些属性如何与其他物质形式及其属性、话语、进化路径、政治决策、污染和其他故事相结合^{[4]7}。物质政治探讨了物质性的政治维度,涵盖了平等主义、殖民与后殖民生态中的物质涌现、文化技术实践与历史政治因素的复杂交织,以及人类与消费、浪费和污染所构成的全球政治网络。此外,它还涉及常态与自然、异常与非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医疗技术在服务生命与重塑身体医疗工业综合体中的矛盾,以及人类与自然“常态”在生物政治范畴中的多重意涵。

物质诗学(poetics of matter)通过对艺术、诗歌与哲学的深入关注,探讨能动体如何通过衍射(diffraction)的方式反映并参与世界的生成。

其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借助跨体理论分析物质话语过程的协同作用;通过同情(sympathy)的召唤,揭示身体间相互影响的亲和力,并构建人类身体与动物或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纽带;运用自我生态(ecology of selves)的概念,阐释人类与非人类在共同创造中的交互关系;通过顿悟(epiphany)的视角,探究事物如何涌现并对世界的形成作出贡献。这一框架为理解物质性与创造性的动态关系提供了多维度的理论支撑。

总之,解构人类和非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是物质生态批评的主要使命。物质生态批评主张物质自我和其他物质处于平等关系之中,人类不再优越于其他物质,不能凌驾于任何物质之上。物质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方法论范式,突破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局限,倡导对人类主体性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从而构建人类话语系统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关系。物质生态批评“肯定所有物质的能动性、架构起物质与意义的桥梁、认同物质的叙事能力,有利于颠覆西方传统意识形态中的心智/身体、人类/自然、语言/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13]118}。综上所述,物质生态批评作为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批评理论,以其跨国性与跨学科的特质,展现出开放性、多元性的发展态势,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范式。

四、物质故事:物质生态批评的批评实践

物质生态批评通过审视人类和非人类物质,成功地实现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再认知。生态批评作为当前环境人文学“大江”中的一部分,已经不满足于文学文本中有关自然环境的书写,而将研究视野延展至整个物质世界,去聆听块茎结构中不同物质所叙述的“自己”的故事的兴起^{[13]120}。近年来,诸多研究者逐渐将研究视野从文学文本中对自然环境的表征,转向更为广阔的物质世界,聚焦于物质网络中不同物质实体的叙事话语及其交互关系。

国际学界从物质生态批评的理论视域出发,对物质性现象进行了多维度的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揭示了物质、文本与生态之间的复杂互文关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范式与批评维度,陈述了异彩纷呈的物

质故事。温迪·惠勒（Wendy Wheeler）在《自然游戏、自然隐喻与自然故事：生物符号现实主义》（*Natural Play, Natural Metaphor, and Natural Stories: Biosemiotic Realism*, 2014）一文中，通过讨论生物符号学的故事，展示了审美形式与自然形式之间存在的同源性，思考了人类和非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以及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作品有自己的生命，思想和知识不局限于人类，人类需要与周围所有的生活和思想建立对话关系。沙利文在《色彩的生态学：歌德唯物主义光学与生态后人类主义》（*The Ecology of Colors: Goethe's Materialist Optics and Ecological Posthumanism*, 2014）这篇文章中，用新唯物主义解读了歌德颜色理论，认为歌德的理论聚焦通过光、能量、身体性质和技术动作的内在作用而产生颜色的方式，关注物质内部的作用。伊奥维诺在《那不勒斯的身体：故事、物质与多孔景观》（*Bodies of Naples: Stories, Matter, and the Landscapes of Porosity*, 2014）一文中，分析了那不勒斯这座多孔城市的故事话语，关注自然和记忆的衍射动力。洛厄尔·达克特（Lowell Duckert）在《下雨的时候》（*When It Rains*, 2014）一文中，讨论了雨这种物质，提出雨的能动性一般是隐秘的，它只有不规则地降落或导致某些东西失效才会吸引人类的关注。他认为，世界不应划分为主体与客体两个部分，世界是一种物质的集合。西蒙·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在《痛苦的物质现实、悲剧与生态恐惧症》（*Painful Material Realities, Tragedy, Ecophobia*, 2014）一文中，通过讨论疼痛、死亡以及生态恐惧症，关注非人类物质能动性的威胁。蒂莫·马兰（Timo Maran）在《物质的符号化：生物符号学与物质生态批评之间的混合地带》（*Semiotization of Matter: A Hybrid Zone between Biosemiotics and Material Ecocriticism*, 2014）一文中，将环境在物质和符号方面由人类塑造这一过程称之为“物质符号化”，认为人类将物质符号化这一方式会干扰非人类物质的自我物质感知和诠释环境的能力。卡特里奥娜·桑迪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在《蜂群政治：蜜蜂政治生活的三次探索》（*Pro/Polis: Three Forays into the Political Lives of Bees*, 2014）一文中，将人类和蜜蜂之间物种间的联系作为一种生物政治联系加以揭示。达娜·菲利普

斯（Dana Phillips）在《排泄物生态批评与全球卫生危机》（*Excremental Ecocriticism and the Global Sanitation Crisis*, 2014）一文中提出，排泄物从人类的视线和意识中消失，体现了现代社会产生和抑制环境危机的方式，其涉及殖民和后殖民生态的物质涌现、文化技术实践和历史政治因素的纠结。贝内特在《论物质共情、帕拉塞尔苏斯与惠特曼》（*Of Material Sympathies, Paracelsus, and Whitman*, 2014）一文中，通过比较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炼金时对身体感官特性的调适以及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在《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中对“共情”的召唤，提出了“共情”理论——不同物质身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亲和力。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生命之源：阿凡达、亚马逊与自我生态》（*Source of Life: Avatar, Amazonia, and an Ecology of Selves*, 2014）一文，分析了《树木有母亲》（*The Trees Have Mothers*, 2008）和《阿凡达》（*Avatar*, 2009）这两部电影，指出电影呼应了亚马逊口头传统的宇宙观，认为多元自然世界乃由人类和非人类共同创造。在《物质生态批评中道德伦理论述的可能性与局限》（2017）一文中，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现代语言与文学系的张嘉如对物质生态批评主张的道德伦理实践之可能性提出了质疑。

在西方理论建构与批评范式确立的同时，国内学界在跨文化视域下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阐释与批评实践路径。一方面，国内学界对物质生态批评进行了理论建构维度的系统性回应。唐建南在《物质生态批评——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一文中，主要梳理了物质生态批评中物质及其施事能力、物质与意义、物质与叙事等主要观点。在《21世纪生态批评理论的多元互补》一文中，张慧荣提出，物质性、叙事性和可持续性等多元理论在21世纪的生态批评中形成了互补性。韩启群在《21世纪全球环境危机与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物转向”》一文中指出，外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物转向”和生态批评聚焦环境危机的核心旨趣一脉相承。“物转向”不但催生了当前生态文学研究选题的新趋势，也推动了生态批评话语的迭代更新，更是构筑了环境危机书写研究的多重视角。叶玮玮在《“块茎性共生”：物质生

态批评理论探析》一文中提出,物质生态批评理论“旨在建构一种块茎性共生式的本体认识论范式,传达了一种不分种族物种而共享物质能量的共同体愿景”^[14]。

另一方面,国内学界采用物质生态批评的阐释框架,对现当代文学文本展开了深入的话语分析与生态解读,其在文本细读与理论阐释的互动中,不仅深化了对作家创作生态意识的理解,更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阐释维度。庞慧英、张昌宋《自然书写——中西方诗歌中的物质生态意识》一文,从自然的能动性、叙事能力和施魅性视角分析了东西方诗歌中体现的物质生态意识,认为承认自然具有施事能力和叙事能力有助于摆脱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状态,建立人与自然平等的整体生态系统。张建国《蕾切尔·卡森〈海风下〉物质生态批评解读》一文,从物质能动性和叙事能力两个方面解读《海风下》,认为作品广泛使用拟人化的描写手法,凸显了物质的叙事能力。付文中《毒性物质、中毒身体与物质伦理——印德拉·辛哈〈人人都叫我动物〉的物质生态批评解析》一文认为,《人人都叫我动物》这部小说就是一部毒性话语文本,其表明具有施事能力的毒性物质始终在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物间运行、交换、转移,构成中毒身体,最终会影响作为物质共同体的人类。张丹《物质生态批评视角下〈上层林冠〉中的生态伦理思考》一文论及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 1957—)的小说《上层林冠》,认为该小说描述了后人类主体与植物的共生关系,表现了植物保护者为维护生态进行的抗争。这种抗争既是一种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抗争,更体现了人们对生态伦理的思考。赵莹《物质生态批评视角下〈瓦尔登湖〉再解读》一文认为,梭罗将瓦尔登湖与人类的地位摆在平等的位置,阐释了物质的施事能力和叙事能力。方红、刘怡《跨躯体时空的物质伦理——斯坦格雷伯〈生活在下游〉》一文指出,桑德拉·斯坦格雷伯(Sandra Steingraber, 1959—)的《生活在下游》(*Living Downstream: An Ecologist's Personal Investigation of Cancer and the Environment*)体现了斯塔西·阿莱莫所称的物质伦理,作品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环境正义感。他基于阿莱莫跨躯体理论,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深度阐释,呼吁社会各界要严控

毒性物质的生产与流通,注重践行物质伦理。任和《物质生态批评视域下〈穿越雨林之弧〉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一文,从物质的施事能力以及叙事能力出发,探讨了人类与非人类物质生命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韦清琦《物质生态批评视域中〈嘉莉妹妹〉的车叙事》一文,从物叙事角度出发,认为小说中“车”,已然超越被人类规限的运输工具这一功能,“成为一种强大的有故事的物(storied matter)”^[15]。

从物质生态批评的批评实践轨迹中可见,研究者着力于非人类物质的能动性表征与叙事潜能的理论开掘,通过去人类中心主义批评视角,重构了物质、文本与生态的三维对话空间。这种批评实践不仅颠覆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人类中心主义范式,更在物质生命共同体视域下,构建了现实社会与文学世界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存的生态图景,为理解当代生态危机与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与批评路径。

五、未完成性:物质生态批评的缺陷

物质生态批评挑战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提出物质世界具有能动性,并引入物质叙事、跨物质性等创新概念,为生态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其价值自不待言,但其本身也的确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首先,该批评的核心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边界,容易导致理论应用的混乱。该批评将“能动性”这一概念从人类扩展到非人类物质,但这种扩展缺乏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边界。在“跨物质性”概念下,毒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否应被视为毒素的“能动性”,还是其仅仅是化学反应的结果?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物质能动性”是否适用于所有物质,还是仅限于某些特定物质?这一问题也有待澄清。

其次,该批评的理论框架虽然试图通过引用量子力学、双缝干涉实验等科学发现来支持其核心观点,但其理论基础仍然存在显著的空想性。量子纠缠理论描述的是微观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物质生态批评试图将其推广到宏观世界中对人类与非人类物质关系的认知上,这一推论缺乏科学依据;双缝干涉实验揭示了微观粒子的波粒二

象性和观测者效应，但这一现象仅限于微观尺度，物质生态批评却将其扩展到宏观生态问题的讨论，其存在逻辑跳跃问题。

再次，该批评在实践中也经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比如，在强调物质伦理层面，如果一味强调物质的平等性，那么极有可能弱化人类自身的责任担当。非人类物质与人类从本质上是平等的，但因为其能量构造的不同，其能动性应该是有差异性的。如果非人类物质具有能动性，人类是否应对其承担伦理责任？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尽管物质生态批评研究者引用了大量的跨学科理论，创造了不少新的术语，然而对于如何应对当下气候巨变、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具体生态窘境，其似乎并未形成清晰的方案。正如史坦纳（Gary Steiner）所说，其在论述上大做文章，但对缓解当今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动物处境的悲惨无实质贡献^[16]。

由此可见，物质生态批评存在概念定义不明确、边界不清晰，理论基础不扎实，实践指导不可靠等缺陷。未来，物质生态批评需要在理论构建、科学论证和实践应用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以克服其解构与泛化生态批评的难题。

物质是自然世界的客观存在，关于物质的思辨，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在生态批评发展的第四次浪潮中，来自物理量子学、哲学、生态科学、环境与人文科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研究等不同领域的弄潮儿勇敢地走向了浪潮的前沿，为实现物质世界和谐共生愿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形成了生态批评的新质生产力。物质生态批评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化、多学科交融的背景下实现了其开放式、多元化的理论建构，并被广泛地应用于文本实践，同时对生态批评的发展以及环境人文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物质生态批评强调物质故事话语的重要性，抓住了影响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启发了物质伦理研究和哲学发展的新方向；物质生态批评阐释和评价物质世界的运作，以批判性眼光审视人类处境、探索人性含义；物质生态批评学者反思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认为跨国资本主义、技术发展至上和漠视非人类物质倾向对物质世界产生了摧毁性效应，表达了对物质世界的人文关怀，认识

到物质之间的内在互动，最终实现了从物质自我的小我关注辐射到万千世界的大我关怀的批评视野转换；物质生态批评试图从根本上消解主客二元对立以及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其对构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地球生命共同体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尽管物质生态批评依然是未完成的物质故事理论，但笔者相信，这种未完成性能够赋予其未来探索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BU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M]. New York: Blackwell, 2005.
- [2] ADAMSON J, SLOVIC S. 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 An Introduction to 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 [J].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 2009, 34(2): 6-7.
- [3] HARAWAY D. The Haraway Reade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4] IOVINO S, OPPERMAN S. Material Ecocriticism[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5] 韩启群. 21 世纪全球环境危机与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物转向”[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22(2): 109-118.
- [6] SLOVIC S. Editor's note[J].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2019, 26(3): 513-517.
- [7] BARAD K.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140.
- [8] ALAIMO S, HEKMAN S. Material Feminism[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2.
- [9] ABRAM D. Becoming Animal: An Earthly Cosmolog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 [10] ALAIMOS.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3.
- [11] BENNETT J.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13.
- [12] 唐晓云. 生态叙事学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推进[J]. 东岳论丛, 2021, 42(10): 85-94.
- [13] 唐建南. 物质生态批评：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J]. 当代外国文学, 2016, 37(2).
- [14] 叶玮玮. “块茎性共生”：物质生态批评理论探析[J]. 外国文学研究, 2023, 45(3): 32-44.
- [15] 韦清琦. 物质生态批评视域中《嘉莉妹妹》的车叙事[J]. 鄱阳湖学刊, 2024(3): 68-76, 157.
- [16] STEINER G. Animals and the Limits of Postmodern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130.

责任编辑：黄声波